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的东方学阐释

An Orientalism Interpretation of Giles'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李群 (Li Qun)

内容摘要: 对于翟里斯的《中国文学史》，学界多从国别之学（汉学或中国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和研究，实际上该书超越了汉学研究的范畴，作者主要从亚洲区域文学或东方学的角度把握中国文学，并引入欧洲早期东方学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和汉民族的历史起源；同时，体现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归化式英译，也体现了早期中国文学英译中的西方主义文化强势。因而，突破以往作为国别研究的汉学视角，从东方学的角度对翟氏《中国文学史》加以观照和阐释，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其研究特色与学术价值。

关键词: 翟里斯；区域文学史；东方学；“东方 - 西方”观

作者简介: 李群，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西方“中国文学史”研究与西方东方学的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欧洲的“中国文学史”【项目批号：15bWW008】

Title: An Orientalism Interpretation of Giles'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scholars mostly studied Giles'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logy or Chinese Studies. In fact the book goes beyond the scope of Sinology research, and Giles grasps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ian regional literature or Orientalism, and introduce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ligion in early Europe Oriental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an nationality.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hich is embodi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t also embodies the strong Western culture in the translation of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thus,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inology perspective as a countr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the paper is helpful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and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value of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Gile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rientalism; the “East-West”

outlook

Author: Li Q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modern Europe and Western Oriental studies (Email:liqun2008book@163.com).

翟里斯 (Herbert A. Giles, 1840-1934) 撰写了世界第一本英文版《中国文学史》¹, 奠定了他在世界汉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因而一直以来,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汉学角度对此加以看待和研究, 而少有学者从东方学的角度对翟氏《中国文学史》加以观照和阐释。我们考察翟氏《中国文学史》, 无论是其采用欧洲“总体文学”观治理中国文学史, 还是运用早期东方学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 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对入选的文学作品采取的翻译策略, 都属于东方学的范畴并可以从东方学的角度进行阐释。

一、作为东方区域文学史的翟里斯《中国文学史》

翟里斯《中国文学史》的出现, 标志着西方汉学研究走向成熟, 并为西方汉学的学科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 研究者很容易从汉学角度对翟氏《中国文学史》进行认识和评价。但是, 研究者们忽视了翟里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特征: 它是一部超越了国别文学、属于区域性研究的文学史, 同时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属性。

翟氏《中国文学史》是在欧洲“总体文学”²观影响下撰写的一部超越国别范畴的区域文学史。早在 18 世纪末, 德国学者便开始使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1883 年, 英国的蒙哥马利发表《关于总体文学、诗歌等的讲演》。同年, 伦敦还成立了总体文学与科学系。汉学家翟里斯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期欧洲学术风气的影响, 自觉以“总体文学”观来观照中国文学。而且, 在翟氏《中国文学史》问世之前, 欧洲就已经有乔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卡尔·施莱格尔《古代与现代文学史》等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超越国别范畴, 将欧洲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并采用整体的、区域的方式进行把握。从一定意义上, 其对欧洲文学的总体研究属于“欧洲文学史”的范畴, 这些著作属于区域文学史。翟氏《中国文学史》沿袭欧洲“总体文学”观, 书中多次出现“总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7)。下文只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2 “总体文学”: 又名一般文学。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第 206-12 页) 中最早赋予这个术语以新的与“比较文学”相对的特殊概念。他认为, 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代表三个联结的层次。民族文学的研究限于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 比较文学通常探讨两个国家的文学问题; 总体文学则专门研究许多国家中共同发展的问题, 这些国家往往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而自成一体, 如欧洲、欧美、东方等等。

体文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将欧洲学者视欧洲文学为一个整体并采用整体的、区域的方式进行把握的思路，移植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他在论述中国戏剧和小说的起源时，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亚洲论述其诞生背景。他在论述《玉娇梨》为何受到国外读者青睐时说：“部分是因为它的故事相对不那么冗长。普通的中国人喜欢长一点的小说，并不介意小说像荷马的小说一样，荷马小说因为多是先口述流传然后再经过后世文人加工而成，重复冗长。（它受国外读者喜欢）也可能与前面表述的观点相关，就是中国的小说最初起源于中亚”（134）。翟里斯是将中国文学放在亚洲或东方区域内进行整体考察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超越国别文学、属于东方区域文学史，这是区别大多数文学史家局限于中国范围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可见“总体文学”观对翟氏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影响程度。

“总体文学”观影响下的翟氏《中国文学史》不仅采用了区域性的、跨国别的研究方法，还运用了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翟里斯专门就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学，如佛教与唐诗、佛教与《红楼梦》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说明。翟里斯留意到文学媒介的演变对文学的影响，他在《木板印刷术》《报刊文学》等文中细述了传统文学媒介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郑振铎批评翟氏《中国文学史》“滥收”，和“详略不均”，“一方面把许多应该叙及的人，都删去不讲，一方面滥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的东西，如法律条文，博物学书之类，而且叙述的很详细”（郑振铎 51-52）。翟氏《中国文学史》不仅研究中国的诗歌、小说、戏曲等内容，还将医学、天文、科技、园艺、饮食等作家作品纳入其中，更像一部文化史。翟氏《中国文学史》在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时，不是简单的就文学论文学，而是把中国文学放置在文化范畴里进行考察和阐述，对中国文学与宗教学、媒介学等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

翟氏《中国文学史》为了说明中国文学特征还进行了跨文化研究。欧洲学者习惯将中国当作亚洲的一部分、将中国当作东方，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整体比较，说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东方文学、西方文学的差异性。翟氏沿袭欧洲学术传统，将中国视为东方，进行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翟氏评价《红楼梦》说：“至少 400 多位重要人物形象出现在书中，故事情节的设计完全可以与菲尔丁的小说相媲美。故事中的人物谱系复杂——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让人联想起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家竭尽全力完成的作品”（152）。翟氏将《红楼梦》放置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予以评价，认为其采用文学的方式写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妄图将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展现出超自然的特征。由此，翟氏《中国文学史》不仅是表现了中国文学的特点，还具有世界文学的特征。翟里斯为说明中国诗歌、小说和戏剧等的特征，从而进行中西方文学比较，翟氏《中国文学史》不仅是一部简单的国别文学史，还是一部比较文学史和东西方文学史。因为文学研究属于

文化研究的范畴，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隶属于不同文化范畴，使得该著具有跨文化研究的属性。

翟氏《中国文学史》属于汉学研究成果，但同样属于西方的东方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仅仅从国别文学史、汉学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是不够的、是有缺陷的，研究视野的狭窄会影响到对翟氏及其《中国文学史》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我们对其研究要从汉学视角转向东方学的视角。但要理解这一研究视角上的转变并不容易，首先需要对东方学、汉学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和明晰，才能明白和理解我们将翟氏《中国文学史》纳入东方学的视野进行阐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东方学、汉学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概念。东方学是欧洲人站在东方区域的角度研究东方的学问，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的立场、观念太凸显了就会造成所谓的东方主义。汉学则是欧洲人站在欧洲人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学问，在研究进程中过于凸显欧洲的角度就形成了汉学主义。因此，东方学与汉学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东方学是区域研究而汉学则是国别研究，两者因研究者立足点的不同，而形成了差异。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以中国为研究中心的学问。近代东方学诞生于 18 世纪，而汉学晚于东方学诞生并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出现，换言之，先有了东方学家，再才有汉学家，由此汉学家的学术规范、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带上了浓厚的东方学印记。

翟氏《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学术习惯和研究方法，带有早期欧洲东方学的烙印。相较于欧洲人进行国别研究的汉学，东方学是欧洲学者对东方进行的区域性、总体性研究的学问。东方学家研究中国文学史或研究中国其他问题时，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把中国当作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习惯从亚洲或东方总体的角度把握中国，形成了把中国放在东方区域去观照、研究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方法。这种研究视角从欧洲近代时期到 20 世纪是一以贯之的传统。最早从伏尔泰始一直到 19 世纪东方学家威廉·琼斯都是如此。翟氏《中国文学史》展现了东方学家从东方总体、东方区域把握中国的学术习惯和方法。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将中国的小说、戏曲等放在整个亚洲范围内进行整体考察，将中国放在东方区域内进行观照和考察，使得这部文学史著作就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国别文学史，而是一部具有世界文学背景的区域文学史。比较文学的方法是东方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同样是作为东方学组成部分的东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和研究方法。一定意义上，翟氏《中国文学史》属于东方学的东方文学史研究的范畴，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是其重要手段和方式。翟氏在《中国文学史》中为说明中国诗歌、小说和戏剧等的特征，将其与拉丁诗歌、欧美小说和古希腊戏剧进行对比说明，使得翟氏《中国文学史》带有比较文学史、东西方文学史的属性和特征。东方学不仅是对东方文学进行区域性、总体性的比较研究，还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换言之，跨学科和跨文化是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研究途径。翟氏《中国文学史》

跨越了文学、宗教等多个学科，对东方文学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研究，而非单一的文学史研究。翟氏《中国文学史》区域文学的研究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近代欧洲东方学的研究视野、学术习惯和研究方法高度一致，从而使该著具有近代东方学的浓厚色彩。所以，我们有必要突破汉学的、国别的或语种的限制，从汉学的视角转向东方学的视角，这样对翟氏《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和评价就会较以前的视野扩大许多，在方法上也会有所更新突破，也才能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翟氏《中国文学史》。

二、翟里斯《中国文学史》与东方学的学术方法

要全面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史》，还需要理解和熟悉翟里斯撰写《中国文学史》采用的学术研究方法。翟里斯《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与近代欧洲东方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学术渊源关系。

早期东方学家通过比较印度梵文和欧洲语言中一部分词汇在词根、语法上的相似性，进而确定了印欧语言的关系。18世纪下半叶，有“东方学之父”美誉的威廉·琼斯通过研究欧洲语言和梵文词根的相似性，提出了著名的“印欧语假说”¹，即梵语与欧洲语同源的说法。1833年至1852年，德国东方学家弗朗兹·波普关注印欧语言语法上的一致性，并撰写三卷本《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论证了印欧语系的存在，标志着近代比较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威廉·琼斯和弗朗兹·波普一道，推动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反之也促进了东方学的进步和发展。东方学家对两种不同语系文字关系的确定，这对重新勾勒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印度的历史、审视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坚实的证据。长期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德国东方学巨擘弗雷德里希·马克思·穆勒则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延伸至宗教领域研究，通过宗教信仰、语言的相似性确立不同民族之间在起源上和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性，这对认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早期东方学家运用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主要还在于论证《圣经》内容的权威性，无论是威廉·琼斯的印欧语言研究还是马克思·穆勒比较宗教学研究，他们主要目的还在于维护《圣经》的神圣性。他们通过对印欧语言和宗教的比较研究，论证印欧语言的相似性、宗教信仰的同源性，在重构印度上古史的同时，进而将印度文明纳入西方基督教知识体系。简言之，近代欧洲东方学家意图通过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广泛比较，重新认知和解读东方古代文明及东方民族的历史起源，进而重新整理出人类早期文明史。

1 “印欧语假说”：威廉·琼斯在1786年的亚洲学会上的年度演讲中提出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极为相似，三种语言同出一源的观点。1813年，英国语言学家阿瑟·杨正式将琼斯提出的概念命名为 In-European，并最终形成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Family）的概念。

汉学作为早期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稍晚于东方学诞生。欧洲汉学研究受到早期东方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欧洲东方学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方法为欧洲汉学家们广泛采用。他们将东方学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到汉语的研究中，将汉语和世界语言联系起来，进而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早期东方学家十分关注印度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汉学家们也想弄清楚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及其在整个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们注意到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在语音和字形上巨大的相似性，进而将中国文明的源头与巴比伦、埃及文明联系起来。汉学家翟里斯深受此期东方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从汉语与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文字字形和语音之间的相似性出发，探索 and 发现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联性。既然人类的起源是《圣经》的创世纪，那么中国人从哪来也成为汉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翟里斯支持“中国人种西来说”。他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没有人知道中国来自哪里？”（4）但是，随后他引用了两种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有理论认为，他们是从古巴比伦王国阿卡迪亚迁移过来的；其他人则是消失的以色列部落。”理由是，“从人种学的理论来说，每个种族都是来自本领土以外的地方”（4）。不难看出，翟里斯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观点的提出受到了早期东方学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受到同时期的法国东方学家拉克伯里学说的影响。拉克伯里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任教期间出版了《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等著作，他从人种学、民族学等角度出发，论证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传说等皆与巴比伦相似，进而提出中国文明和汉族人均由巴比伦而来。此观点发表后一时轰动学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翟里斯与拉克伯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注意到其学说并接受他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神话中过滤出历史是当时东方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东方学家对印度早期历史的重构，依靠的便是《吠陀》”（陈喆 114）。东方学家认为《吠陀》记载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神话，《吠陀》内容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因而对印度的历史必须进行重新勾勒。欧洲汉学家将东方学家研究印度上古史的方法运用到汉学研究上，怀疑和批判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献并质疑其真实性。1901 年，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的《道教一道德经》一节中指出《道德经》并非老子所写，而是后来伪造的。他认为我们对老子知之甚少，“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老子写过这样一本书”，甚至朱熹等人都质疑《道德经》的真实性（57-58）。此论一出，立马引发了西方汉学界关于《道德经》真伪问题的激烈争论。不难看出，翟里斯自觉地将早期东方学者研究印度文明的方法运用到汉学研究中，对中国文献典籍的真实性提出批判和质疑。既然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典籍的真实性都令人存疑，那么这些文献典籍记载的历史就颇令人怀疑了，西方汉学家由此对中国文明的悠久性和中国文化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翟里斯对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存在怀疑,认为中国历史很大一部分存在虚构。在《中国文学史》第一章即“传奇时代—中国早期文明—书写的起源”中,他认为中国的学者是人为的在创造一段与祖先相关的历史,而且,中国历史学家将本国历史的开端认定在一个充满神话和传奇故事的皇帝身上,令人充满疑惑(3-4)。翟里斯并非是第一个对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人。早在17世纪,欧洲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当时传教士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一书中说中国历史开端于诺亚洪水前2952年,推算起来,中国历史已有近五千年。这惊动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便否定了《圣经》中创世纪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随之受到威胁。欧洲人为维护《圣经》的权威,只能否认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极力缩短中国历史长度(张国刚107-108)。英国另一位汉学家理雅各沿用早期东方学的方法,论证《圣经》记载内容为导向,竭力维护其权威,将中国典籍中具有神话性质的上古人物纳入基督教体系进行解释,他在其《中国经典》的序论部分中提出大多关于尧、舜及其相关文献都是传说大于历史。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序言中明确提到他引用了理雅各的观点,表明翟里斯认可和借鉴了理雅各的学说。由此可见,以翟里斯为代表的汉学家们对早期东方学学术传统的认同和接受程度。

19世纪末,汉学家对中国人种的由来、对《道德经》真实性的怀疑,进而对中国文明的悠久性提出质疑,根本目的还在于宣扬和维护“纯正的宗教”——基督教。换言之,早期汉学家沿袭了早期东方学的操作方法和思维方式,来认识和处理中国文明和中国宗教。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中频频使用基督、救世主及其衍生词来比附表达类似意蕴的汉语词汇,将儒家的“天”翻译为“基督”,采用穿凿附会的方法任意诠释中国经典,力图从中找出天主创造世界、灵魂不灭、天堂和地狱的存在并非虚构的依据,以此来证明中国早就有了基督教(马祖毅、任荣珍35)。翟里斯的想法和研究思路具有代表性,他在此无疑沿袭了早期东方学的操作方法,他认为上古中国人同样信仰上帝,只是受到迷信的影响走向堕落并迷失了方向。很明显,翟里斯对中国人宗教信仰迷失的原因与马克思·穆勒对雅利安文明在印度次大陆的衰落的论断如出一辙。穆勒认为尽管文明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但因与被征服者的通婚却逐渐丧失了其自身文明的光芒。以马克思·穆勒为代表的早期东方学家力图通过语言和宗教上的比较,证明上古时期的印度和中国与其他人类族群在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性,为将中国文明纳入到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中提供有力证据。翟里斯沿袭早期东方学家的学术传统,并将其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

不难发现,18世纪末出现的早期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传统对汉学家翟里斯的学术方法和研究论断,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并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定意义上,翟氏《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亦是19世纪东方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翟氏《中国文学史》

的诞生与东方学研究息息相关，这是以往我们忽视的地方，但却是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其《中国文学史》的诞生及其写作特点的一个极其重要途径。

三、翟里斯的“东方－西方”观与《中国文学史》的译介策略

东方观是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东方学家发表的对东方问题的评论观点和看法。翟里斯的“东方－西方”观指的是其基于西方中心的立场发表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言论，同样属于东方学的范畴。翟里斯的“东方－西方”观促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文学作品采用归化式英译策略，同时体现了早期中国文学英译中的西方主义文化强势。

翟氏《中国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主要以其早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为主。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序言里说“我已经将翻译作为这本书的大部分”（2）。据统计，《中国文学史》中涉及的两百余名作家及其作品，有59位来自其早期翻译著作《古文选珍》，101位来自《古今诗选》。《二十四品》《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都是其翻译并在报刊上发表过，因此，我们视《中国文学史》为一部翻译中国文学史也毫不为过。一定意义上，翟里斯是一位东方学家兼文学翻译家。翟里斯认为“汉学家首要的、最根本的任务在于忠实、正确地翻译中国文本”（Giles,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356），他在《中国文学史》中实践着他的翻译理念。波乃耶在《中国评论》上撰文对翟氏《中国文学史》大加赞赏，指出以往的英译汉籍虽然数量众多，但因翻译不到位反而加深了英国读者对汉籍的偏见，而只有翟氏的译文“使汉籍‘英语化’（Englishes）了”，“中国文学之精神经过他的提炼，以欧洲语言的‘肉身’展现在我们面前”（Ball 208）。《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多次再版，其译作受追捧程度及其译文水平高低可窥见一斑。

翟里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歧视和偏见，但如果介绍的中国文学过于“中国味”就很难让英国读者看明白和接受。为了迎合读者，翟里斯将作品进行了“英语化”的处理，即在《中国文学史》中对入选作家作品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在《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中，他将“道士”译为“Taoist priest”，将“方士”则译为“magician”，还将方士的法术译为“magical skill”。翟里斯不但采用英文词汇去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富有文化色彩的词语，还用西方的人物和文化典故去代替中国人物形象和文化典故。他将指称美人的“倾国之姝”翻译为“绝色海伦”（a perfect Helen for beauty），在翻译明代高濂的《玉簪记》中“潘郎与妙常”的典故时，将其译为西方人家喻户晓的“Abelard”（阿伯拉尔）和“Eloisa”（爱洛依丝）。

翟里斯归化的翻译策略还表现在其依据当时英国小说创作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国的诗歌和小说进行增减、删节、改写和随意发挥。中国的古典散文、小说等具有“评注”传统，如《史记》结尾处多有“太史公云”，《诗经》

每一诗篇前附有《诗序》，而《聊斋志异》的故事后多以“异史氏曰”结尾，这些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征。翟里斯受当时英国小说创作观念的影响，为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对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组成部分采用删节、改写或全部予以删除不译。如他在《中国文学史》中翻译《聊斋志异》的《种梨》和《崂山道士》，原文中的“异史氏曰”全部删除不译。正如有研究者所说：“他对《聊斋志异》各篇故事末尾处的‘异史氏曰’部分的删除，是为了使译文符合当时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余苏凌 470）。另外，翟里斯为了使中国古典小说作品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风尚，还对《聊斋志异》中的《画壁》、《画皮》等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写。为符合当时英国人清教徒身份的需要，他将作品中的男女青年关系大多改写为正常的夫妻关系，并对小说中的男女情色部分、性爱场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和删节。

翟氏《中国文学史》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还表现在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采用了大量的注释。为了方便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中文译本的内容，他在翻译时采用注释对涉及中国习俗、礼仪等内容部分进行详尽的说明。如他在翻译《聊斋志异》时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全部 164 篇故事中有 159 篇采用了注释的方式。他为了让英国读者明白蒲松龄的叙事风格，就将其与英国作家卡莱尔相提并论，借此说明蒲松龄的叙事特征。在《画壁》中，为了让英语读者理解男主人公穿越画壁的情形，他列举英语文学作品《爱丽丝奇遇》中女主人公穿越镜子的情形对比说明。翟里斯采用了大量注释的方式，这与其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接受习惯，方便读者接受他的译本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翟里斯说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在于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和信仰等，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误解。我们赞扬翟里斯传播中国文化的善意举动，肯定其克服语言障碍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勇敢之举。但我们审视翟里斯极力将《中国文学史》“英语化（Englishes）”的处理，关注的不是其文学翻译策略，而是要揭示翻译文本中所彰显的译者的“东方－西方”观，以及翻译策略背后的西方主义文化强势心理。

东方主义是欧洲学者站在西方人的立场看待东方文明的文化心理，西方主义是西方人基于西方文明中心的意识看待世界文明的心态，而翟里斯的“东方－西方”观是其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看待东方文明的优越意识。翟里斯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表明其对本国文学和文明的高度自信和优越意识，认为英语文学和英国文明相比中国文学和中国文明有着更大的优势。长期以来，西方人认为欧洲民族和西方文明要优越于那些非欧洲民族和其他文明形态，西方文明是衡量文明的价值尺度和判断依据，享有支配东方文明的权力。西方许多学者对欧洲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赞不绝口，对东方及东方文明则持不屑的态度。翟里斯虽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充满了好奇和研究热忱，但他对

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学的看法似乎也很难摆脱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的窠臼。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的《诗经》一节中，认为中国学者刻板保守，“中国学者总囿于传统的评论，但欧洲的学生却会去寻找诗歌本身的意义”（14）。他还在《论语》一节中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比较之后说：“我们应该知道，这句消极形式的格言是不能与我们基督提出的那些积极形式的格言相提并论的”（32）。在这种中国观的支配下，翟里斯在翻译和处理中国文学作品时，欧洲总是处于中心地位，喜欢用西方同类事物来比喻中国文化，如将传说中将腓尼基字母传入希腊的希腊英雄卡德摩斯比作仓颉，将具有毁灭性的诺亚大洪水比作大禹时期的洪灾。正是在优越的文化心理主导之下，翟里斯不顾文化差异，随意采用英语词汇替换中国诗歌中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意象、依据英国文化道德观念对中国小说肆意删节、改写。翟里斯归化翻译策略的背后，潜藏着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明先进性、优越性的心理意识。

翟里斯对中国文学作品采用归化的翻译方式，满足了英国民众对中国的期待视野和西方人对中国固有的乌托邦想象模式。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此期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较于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普遍好感，至18世纪末，英国人的中国观为之一变，抨击嘲讽中国人的声浪不断攀升。1792年英王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该使团成员回国后相继出版《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旅行日记和报告。这些日记和报告提供了大量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不利信息，似乎印证了此前英国人对华不良印象，让英国人的中国观急转而下。“此书打破了传教士苦心经营的中国神话。……欧洲人好像大梦初醒，批判贬低中国成为一种报复”（葛桂录 69-70）。结果是“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它们不断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米利耶·德特利 248-251）。

翟里斯的“东方-西方”观是19世纪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的代表性认识，并与众多西方思想家的中国认识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视东方和西方为二元对立的世界，西方世界充满了自由、理性和人文关怀，东方世界则充满野蛮、落后、动荡。如东方的印度充满了迷信、残暴、野蛮，巴比伦和叙利亚等东方国家是充斥着“最粗野的肉欲、最放肆的骚乱”的国度。黑格尔由此认为东方的命运是“被战胜、被征服”，就像现在印度被欧洲的英国人控制一样，将来的中国也难逃此种命运（黑格尔 132）。黑格尔的东方观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仔细比较，不难发现翟里斯“东方-西方”观对黑格尔的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和沿袭。由此可以理解，翟里斯对中国文学作品采取归化的翻译

策略背后，有着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在注释时赖以运作的文化框架建立在他的教育和个人经验之上，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观投射其上，这也解释了为何译作会吸引同时代的读者群”（孔慧怡 97）。翟里斯在《中国文学史》中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面对中国文化意向随意发挥，这一行为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和古罗马时代的翻译家面对东方典籍时的心理是一致的，“在西方，古罗马时代的翻译家以战胜者、征服者的姿态来翻译古希腊的作品，强调‘与原作竞争’而不惜对希腊原作肆意加以改动，以显示罗马人‘在知识方面的成就’”（王向远 139）。翟里斯沿袭了早期西方文学翻译家面对东方文明和文学典籍的处理方式，凸显了其文学翻译中的西方主义文化强势心理和优越的文化心态。英语读者群对翟里斯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及《中国文学史》的追捧和认同，则代表着此期“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深入人心以及英国人文化心理的一种潜在诉求。

翟里斯花费大量心血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他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为其个人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中国的古典作品突破语言障碍进入英语语境，进入了更大的“东方学”学术平台。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西方的东方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翟里斯是站在自身文化立场上去理解、探究、阐释中国文学的，我们要结合其“东方－西方”观对其文学翻译进行认识，这是我们全面理解和客观评价作为西方东方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翟氏《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一环。

【 Works Cited 】

- 阿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
- [Smith, Arthu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rans. Le Aiguo and Zhang Huayu. Beijing: Xueyu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陈喆：“在神话与历史之间——金斯密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学术研究》4(2011):110-19。
- [Chen Zhe. “Between Myth and History – Kingston’s Chinese Civilization Aryan Origin.” *Academic Studies* 4 (2011): 110-19.]
- Dyer, Ball. J. “Dr. Gile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a Review*. Vol. XXV, 4(1901): 204-09.
-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 [Ge Guilu. *Chronicl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Giles, Herbert A.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Pennsylvania: 1st World Publishing, 2004.
- ,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7.
-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4年。
- [Hegel. *History Philosophy*. Trans.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2014.]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Ma Zuyi, Ren Rongzhe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Wuhan: Hu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米利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41-62。

[Détie, Murie. “The Chinese image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19th centu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e*. ed. Meng Hua. Peking: Peking UP, 2001. 241-62.]

余苏凌：“翟里斯英译《聊斋志异》的道德和诗学取向”，《天津大学学报》5(2011): 466-70。

[Yu Suling: “The moral and poetic orientation of Giles’ translating Chinese Strange stories.”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5(2011): 466-70.]

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Wang Xiangyuan.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2004.]

张国刚：“政治无意识：西方为何极力缩短中国历史的长度”，《南风窗》4(2015): 107-08。

[Zhang Guogang. “Political Unconscious: Why the West Is Trying to Shorten the Length of Chinese History.” *South Wind* 4(2015): 107-08.]

郑振铎：“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全集》第6卷。广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51-55。

[Zheng Zhenduo. “Comment on Gile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Zheng Zhenduo’s Complete Works*, Vol.6. Guangzhou: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8.51-55.]

责任编辑：陈晞